

人类学/民族学

简明教程

和少英 姚伟 编著

民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类学/民族学

简明教程

和少英 姚伟 编著

福建师范大学
图书馆
藏书印

1029476



T1049476

人民大学出版社

Q98
HS22

责任编辑:张 旭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民族学简明教程/和少英,姚伟 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01-011354-8

I. ①人… II. ①和… ②姚… III. ①人类学-教材 ②民族学-教材

IV. ①Q98 ②C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8225 号

人类学/民族学简明教程

RENLEIXUE/MINZUXUE JIANMING JIAOCHENG

和少英 姚伟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5

字数:370 千字

ISBN 978-7-01-011354-8 定价:5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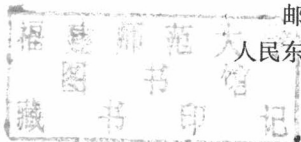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1049476



T1049476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委员会

学术顾问：郑杭生 孙汉董 汪宁生 马 戎 杨圣敏 李路路

姚 洋 文日焕 陈振明 陈庆德 彭金辉

学术文库委员会主任：甄朝党 张英杰

副 主 任：和少英 马丽娟 王德强 张桥贵 王四代

成 员：安学斌 尤仁林 李若青 李 骞 张建国 高梦滔

孙仲玲 谷 雨 赵静冬 陈 斌 刘劲荣 李世强

杨光远 马 薇 杨柱元 高 飞 郭俊明 聂顺江

普林林 高登荣 赵世林 鲁 刚 杨国才 张金鹏

焦印亭



2019.12.29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总 序

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甄朝党

云南民族大学校长、教授、博导 张英杰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培养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高级专门人才的综合性大学,是云南省省属重点大学,是国家民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民族院校。学校始建于1951年8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而创立和不断发展,被党和国家特别是云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全省各族人民寄予厚望。几代民族大学师生不负重托,励精图治,经过近60年的建设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创新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民族问题研究基地、民族文化传承基地和国家对外开放与交流的重要窗口,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办学层次较为丰富、办学形式多样、师资力量雄厚、学校规模较大、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综合性大学。目前拥有1个联合培养博士点,50个一级、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和专业硕士学位点,60个本科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和管理学9大学科门类。学校1979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2003年被教育部批准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社会学博士研究生,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国家级、省部级特色专业、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数、获奖数等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持续增长。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民族语言文化、民族药资源化学、东南亚南亚语言文化等特色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校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得到较好形成和健全完善,特色得以不断彰显,优势得以不断突出,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地位与水平得以不断提升,学校改革、建设、发展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校区建设、党的建设等工作不断取得标志性成就,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明,为国家特别是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发挥作用、做出贡献的力度越来越大。

云南民族大学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长期以来,学校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产出大量学术创新成果,提出一些原创性理论和观点,得到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学术界的好评。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著名民族学家马曜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提出“直接过渡民族”理论,得到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等的充分肯定并采纳,直接转化为指导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为顺利完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维护边疆民族地区团结稳定和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汪宁生教授是我国解放后较早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为民族考古学中国化做出重要贡献,他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最近几年,我校专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多,成果质量高,结项成果中有 3 项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刊发《成果要报》报送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发挥了资政作用。主要由我校专家完成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部分、云

南民族文化史丛书等都是民族研究中的基本文献,为解决民族问题和深化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还有不少论著成为我国现代学术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国家。国家的崛起为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机遇,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 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云南,提出要把云南建成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指导思想。云南省委、省政府作出把云南建成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部署。作为负有特殊责任和使命的高校,云南民族大学将根据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围绕把学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民族大学”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力度,培育和建设一批国内省内领先的学科;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抓好科技创新,提高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把云南民族大学建设成为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高水平民族大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龙头性、核心性、基础性的建设工程,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与重要任务。为更好地促进学校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术创新,学校党委和行政决定编辑出版《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这套文库将体现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特点。经济社会需要是学术研究的动力,也是科研成果的价值得以实现的途径。当前,我国和我省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有许多问题需要高校研究,提出解决思路 and 办法,供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参考和采

择,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我们必须增强科学研究的现实性、针对性,加强学术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才能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社会作用,提高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高校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云南民族大学过去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相信,随着文库的陆续出版,学校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优良传统将进一步得到弘扬,学校作为社会思想库与政府智库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增强。

这套文库将与我校学科建设紧密结合,体现学术积累和文化创造的特点,突出我校学科特色和优势,为进一步增强学科实力服务。我校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这是对我校办学实力和水平的肯定,也为学校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还对学校建设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博士生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它要求有高水平的师资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支持。学科建设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础,我们将按照国家和云南省关于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的要求,遵循“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创新打造特色,以特色强化优势,以优势谋求发展”的思路,大力促进民族学、社会学、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公共管理学等博士授权与支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并将这些学科产出的优秀成果体现在这套学术文库中,并用这些重点与特色优势学科的建设发展更好地带动全校各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努力使全校学科建设体现出战略规划、立体布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全面发展、产出成果的态势与格局,用高水平的学科促进高水平的大学建设。

这套文库将体现良好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规范。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寻真理,创新知识,完善社会,促进人类进步。这就要求研究者

必需有健全的主体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倡导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文库作者要以为国家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公众负责、为学术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严谨治学,追求真理,保证科研成果的精神品质。要谨守学术道德,加强学术自律,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开展研究,撰写著作,提高学术质量,为学术研究的实质性进步做出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思想深度、学术创见和社会影响的成果,也才能让科学研究真正发挥作用。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们的关心支持及全校教学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一定能成为反映我校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和展示我校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品库,一定能成为我校知识创新、文明创造、服务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文库建设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恳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帮助我们将文库编辑出版工作做得更好。

二〇〇九年国庆于春城昆明

前言：从比较的视角前瞻“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①

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对 21 世纪？这是近年来我国民族学界一直在探讨的热门话题。笔者不揣浅陋地拟从比较的角度，依据自己近几年在教学科研以及对外学术交流中的一些感受与体会，谈几点对中国民族学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对人类学/民族学“重新把握”的趋向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整个国际人类学界都在关心和思考着这样

① 这是笔者 1997 年在中国民族学会年会上的一篇发言稿，随后应邀整理成文发表。近期被厦门大学的一家人类学网站刊登，并加了如下编者按：“和少英，纳西族，民族学专家。这篇写于 1998 年的文章的确‘前瞻’得很：号召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重视对周边国家和跨境民族的研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量开展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十多年过去了，国内的人类学海外社会研究仍举步维艰，真正去西方社会研究其主流文化的中国学者更是寥若晨星（只北大高丙中团队有计划、有组织地去澳洲、法国、美国、德国做过田野）。诚然，今天人类学在中国‘火爆’得很，与和文时代的冷清反差明显，尽管还比不上美国。但就研究对象来说，‘本土化’的格局不但无松动，反而更单一，与所希望的‘国际化’正相反，离斯特劳斯所说的人类学研究的最高境界（非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家也研究西方国家）越来越遥远。苛责中国学者无‘世界雄心’也许不公平：人类学将非西方社会（包括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由来已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研究少数民族或汉人农民社会回报（经费、声誉）丰厚，而研究西方社会（研究者个人）得不偿失。所以，在大的学术环境根本改变之前，中国人类学界的‘本土化’会一直是主流。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和少英教授站出来呼吁，有越来越多的高丙中团队不计个人得失勇敢去实践，有越来越多的传统领域的学者‘消除自己设置的壁垒’，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才有真正实现的一天。”

笔者倒并未认为自己有多么“前瞻”，因为这篇小文只不过是讲了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但有朋友认为把它放到本书之首来代一下前言也还算是可以的，于是笔者也就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一字未改地将此文放在了这里。

一个问题:人类学家在当今世界上应当如何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描述这个纷繁万变的世界?这个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之间产生的,而是同近二十年间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巨大发展、变迁密切相关的,并且也同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变迁及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学者戴维·哈尔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判断:“大约从1972年开始,在文化方面发生了如同政治经济方面那样显著的变迁。”他把这种变迁同风靡全球的灵活的资本积累的新资本主义相联系,认为人类社会从此便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发展阶段。^①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亦多次运用独特的天、地、人“三才分析法”,指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历来同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局势密切相关,并着重讲了应顺应时势发展之“天时”的问题。费老在北大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开班典礼上语重心长地讲过一番话:“希望在座的年青一代能看到当今的世界局势正在进入另一个更伟大的时代,一个出现‘全球村’的时代。也许正在这个时候‘鸿蒙’又在找它的借手了(原文如此——编者)。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辜负了这个‘天时’。我总是有一种感觉,从区位优势来看地利,研究这门科学很可能要到东亚来找它的新兴宝地了。”^②时代变了,民族学研究的方向自然也要随之而变。从我国大陆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民族学基本上已同人类学不存在大的差异,完全可以从国外同行的关于究竟应如何“变”的探讨中得到一些启示,然后依据自己的实际去具体操作。

美国在当今国际人类学界居于一种“执牛耳”的地位,美国人类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对我们可起一定的借鉴作用。1993年春,我们应福特基金会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交流考察。在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美国研究学院的新书架上,看到了新近推出的《重新把握人类学》(*Recapturing Anthropology*)一书。由于在此之前曾有密歇根大学的 Beth Norta 博士等多位

①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 7.

② 费孝通:《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转引自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V-VI页。

学者向我推荐过此书,我就抓住机会同该学院院长及出版社长商谈翻译出版事宜,结果十分顺利地获得了免版税出书权。我回来后立即组织我院历史系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开始着手译书工作,并得到云南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基金的重点资助,于1994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该书共分为十章:一、导言:当前的人类学;二、人类学和野蛮人的位置;三、迷人的历史决定论;四、供借鉴:坚定的后现代;五、重写文化;六、关于一种近乎新的文化史;七、典型、种族划分和先驱的民族志;八、反文化著述;九、认识美国;十、全球的民族志概况。

正如该书的主编、杜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理查德·G.福克斯(Richard G. Fox)所说,为了完成对人类进行“重新把握”这一艰巨任务,人类学家“……必须重新进入的是一个并非由我们所造就的世界——而是一个更像是造就了我们的世界。”^①既然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中,人类学家只有更好地顺应时势才可望有所作为。因此,为了达到“重新把握”这门学科之目的,人类学家们自然也就各抒己见地开出了各类药方。其中,以理查德·G.福克斯的“回到文化史去”的主张,格伦海姆·活特森的“重写文化”的主张,以及谢莉·奥特纳等人提出的从“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入手为人类学规定一个新的场所等主张最为引人注目。此外,这本书还提出了人类学家在新形势下怎样做田野工作,如何贴近现代生活,以及如何撰写出新的民族志等问题,给我们不少启迪。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自然也面临着一个对本学科进行“重新把握”的问题,关键之点是找准切入的角度与站在适当的高度,然后脚踏实地去开展工作。

二、学科涵盖范围扩大的趋向

江泽民在访美时曾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世

^① 理查德·G.福克斯主编,和少英等译:《重新把握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比较的视角看一看这两国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存在的差距,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从人才培养的方面来看,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有大学千余所,设立了人类学/民族学系的院校现仅有中央民大、中山大学以及中南民大三所,而且并不是每年都招收学生。两亿人口的美国则有 3500 所大学,其中设有人类学系的大学就有近 500 所(即几乎是中国拥有大学数量的一半!)这些人类学系每年都招收着各层次的学生,其毕业生人数为我国的数百倍!①

再从课程设置方面来看,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理论体系迄今尚未建构起来,很难为各院校的人类学/民族学系或专业提供较为行之有效的设课参考框架。教材缺乏、课程单一、内容陈旧、致使这门学科逐渐失去吸引力。云南民大十年前在西南五省区中率先设立民族学专业并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生时,就已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困扰,这一困扰在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国内其他兄弟院校民族学/人类学系或专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而设立了人类学系或人类学专业的院校,几乎没有一家能按照人类学的四大分支把课程开全,有的已实行隔年招生或干脆停招本科学生……

反观美国的情况,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博厄斯学派崛起以来,高等院校的人类学主干课程设置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况。从一些名牌大学人类学系的现实情况看,所开设的课程竟达百余门之多!这些课程主要涵盖了这样七个大的方面:1. 人类学基本理论及其发展史。包括“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人类学理论发展史”等课程。2. 社会—文化人类学专题。设置了“社会组织与动力”、“社会变迁的理论”、“象征与仪式”以及“婚姻与家庭”等课程。3. 语言人类学。设有“语言与文化”、“语言的田野方法”、“语言人类学”与“社会语言学”等课程。4. 民族学与民族志。除开设有“民族学概论”、“民俗学导论”和“世界文化区划”等基础理论课程外,还有“海外华人”、“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非洲文化”之类分地区、分专题的课程。

① 笔者据《全美人类学会年鉴》等资料整理。

5. 考古学课程。开设了“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人类的起源”和“北美考古”、“东南亚考古”等课程,并侧重于一般性知识的介绍与考古发掘场所的实地观察。6. 生物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主要设置有“生物人类学概论”、“体质人类学”以及“人类社会生态学”之类的课程。7. 独立研究课程。这类课程一般限定了只准研究生与高年级学生选修,主要讲授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技能方面的知识,并由教师个别指导学生独立完成田野调查和撰写出调查报告或学位论文。由于这些课程涵盖面较广,不仅能够拓宽本专业学生的知识面,使之毕业后易于找到同所学的课程多少有些关联的工作,而且还可吸引其他专业的学生前来选修,进而扩大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影响。^①

众所周知,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传授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只要我们能在这方面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上下一番工夫,就可以使这门学科目前这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局面有所改观。我认为当前亟需要做的便是尽量消除由我们自己设置的壁垒或“自我封闭体系”,尽力扩大人类学/民族学这门学科的涵盖面,顺应新一轮“文化热”的潮流适时将它推向社会。全国各地从事这门学科研究与教学的人本来就很少,如果再人为地划分你是搞“民族学”的,而他是搞“人类学”的,你搞的是“学术研究”,他搞的是“政策研究”,恐怕不会使这门学科兴旺发达。

回顾人类学/民族学这门学科传入我国以后几十年来的发展史,提倡涵盖面较广的“大民族学”才会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派”与“北派”学者学术重点的转移倒换,^②以及民族学仅研究乡村与少数民族、社会学多研究城镇与汉民族这一现实情况,费孝通在北京大学创立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可以说是“符合国情”的,在扩大学科涵盖面方面要做的事固然相当多,但目前在机构设置方面首先应考虑将中国民族学会同中国人类学会合并起来,再把香港、台湾两地的同行吸收进来,尽快建

① 笔者据《全美人类学会年鉴》等资料整理。

② 参见陈其南:《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序言”,台湾: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3年版。

立起一个真正全国性的机构。这将对学科规划以及理论体系的建立等起到有益的作用,还会对扩大学科涵盖面、普及人类学/民族学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等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三、学科的“中国化”与“国际化”趋向

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我们谈论得较多的是学科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趋向,而实际上学科的“国际化”趋向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

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是20世纪初才从西方传入的,老一代学者在初始阶段就较为重视学科的“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而且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人类学/民族学在数十年中的发展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引进方面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出了一批成果。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当年的论著,至今仍是西方国家人类学系学生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必读参考书。但是在此之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同西方人类学界隔绝多年,后者在学科发展方面已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与其之间的差距确实拉大了不少。这并不是说这段时间内我们的人类学/民族学没有发展,我们在民族调查与识别等方面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总的来看这种同国际人类学界基本上相隔绝的状况下的发展,难免会产生出一些值得反思之处。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目前在国际人类学界的地位及影响来看,不仅无法同英、美、法等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还远不如印度之类发展中国家。这恐怕同我们与国际人类学界的相互隔绝、互不了解有很大的关系。

记得十年前在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南京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研修时,有位讲授“国际政治学”课程的美方资深教授给我们的临别赠言是:“做学问不应仅限于‘中国’的眼光,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具备‘国际’眼光。我从你们的提问与讨论中发现你们所关注的几乎全是‘中国性’的问题,而不大关心‘国际性’问题,这是不全面的。即

使我所讲授的不是‘国际政治学’而是‘中国政治学’，你们也得学会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观察和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再从‘国际’的角度观察和研究问题。”教授的这番话既指出了我们那拨儿学生的通病，也对我们今天讨论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当我们在倾心关注学科的“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同时，能否适当关注一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同国际人类学界的“对话”乃至“接轨”之类的问题呢？

在这个方面应当做的工作很多，鉴于目前情况应予强调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应当做好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也可以说是这门学科的“灵魂”。搞好田野调查既可使这门学科的“全貌性”（holistic）和“透视性”（perspective）两大特性得以充分体现，又能够撰写出资料丰富、真实可信的民族志，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尽管搞调查受到缺乏经费之类问题的困扰，但如不走出书斋肯定只会使这门学科失去活力。

其次，我们的研究要尽量贴近现实生活。在《重新把握人类学》一书中就专门有一章，由美国人类学家乔思·E·莱蒙（Jose E. Limon）描述了在一家“工人阶级的舞厅”的体验。这类同现实生活联系得相当紧的例子可举出不少。数年前我在波士顿参加过美国亚洲学会第46届年会，发现美国同行们早已将“关系”以及“工作单位”等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之紧密亦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自己反倒由于种种原因而同现实生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做田野调查时也总是问人家十余年前乃至数代人以前的事，这样得来的“研究成果”怎么会使普通老百姓及本专业以外的学者感兴趣呢？！

其三，要重视对周边国家和跨境民族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服务。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量开展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类学研究。阮西湖教授的《加拿大民族志》《澳大利亚民族志》二书和一系列论文，在研究西方国家方面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希望有更多的人接下去

做。正如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所说,只有到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家研究非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家也研究西方国家时,人类学研究才算达到了最高境界。

最后,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上应大力提倡消除门户之见,尽量少在“民族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之类术语的争论上过多花工夫,以便尽快实现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同国际人类学接轨。如果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仍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学科地位将无法确立和提高,这支为数不多的教学科研队伍会成为一盘散沙。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仍将首先面临着整合的难题。